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学术文丛

抗日战争时期
大后方
糖业统制研究
——基于四川糖业
经济的考察



赵国壮 / 著



科学出版社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学术文丛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糖业统制研究

基于四川糖业经济的考察

赵国壮 /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糖业统制研究：基于四川糖业经济的考察 / 赵国壮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8

ISBN 978-7-03-045412-6

I. ①抗… II. ①赵… III. ①抗日战争-制糖工业-工业经济-研究-四川省 IV. ①F426. 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192268 号



责任编辑：杨 静 陈 亮 / 责任校对：邹慧卿

责任印制：张 倩 / 封面设计：黄华斌 陈 敬

编辑部电话：010-64026975

chenliang@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 年 8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5 插页：2

字数：272 000

定价：7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序

光阴似箭，转眼之间赵国壮博士毕业已有数年，如今已成家立业，各方面都收获甚丰。其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申报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也顺利结项，即将出版。作为他攻读博士学位的指导老师，我对学生所取得的各方面成绩自然深感欣慰，也很高兴为其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作序。

我对在读的学生，无论是博士生还是硕士生，要求都比较严格，基本上未曾当面称赞过学生的优点，而是经常指出其不足及需要改进之处，并且由于本人性格的原因，平日与学生交流时往往是不苟言笑，态度比较严肃，致使许多学生都难免会产生一种敬畏之感。尽管早已知晓这种状况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大胆求教和成长进步，希望能有所改进，但却因个人之本性难移，一直成效不著。

不过，在这里还是要说一下我所了解的赵国壮，也许所说并不十分准确，但却是三年师生交流，以及他毕业后数年继续与其接触形成的直观感受。客观而言，国壮的学术天资与禀赋并不是十分突出，但他所具有的另一一些特点与优点却较为显著，即为人诚朴谦逊，学习勤奋刻苦，治学严谨踏实，而且具备勇于承担各项具体工作的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为人诚朴谦逊，不仅使其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且有利于更为广泛地获取学术信息与养料，得到许多人的支持与帮助，得以在学术道路上更好、更快地前行；学习勤奋刻苦则促使其一心向学，能够较快地奠定专业基础知识，掌握相关理论和方法，具备较强的独立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治学严谨踏实，更使其能够在治学过程中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提升，收获了一份又一份有分量的学术成果。现今的年轻学人，为了能够集中时间和精力治学，常常不愿较长时间承担

一些非学术研究性的工作，但这些工作在一个重要学术机构又必不可少。国壮的难能可贵之处，是在个人从事研究和教学之外，还承担了西南大学“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的许多事务性的具体工作，并且任劳任怨，得到了该校历史文化学院领导和老师们的一致好评。

国壮博士毕业后到重庆的西南大学求职，虽然得到了历史文化学院的充分肯定，但由于某些客观原因，当年未能获得正式教师编制，不得不以博士后的身份进入西南大学。起初，还曾担心他博士后出站以后是否能够顺利留校任职，但不久之后，即听说他因各方面表现优秀，学院已决定聘其为正式教师。随即又不断地接连获悉其好消息，如2014年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顺利评上副教授，而且得以享受国家计划生育新政策，在原已育有一子的情况下又生一女，可谓事业、家庭双丰收，可喜可贺。

现今即将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糖业统制研究——基于四川糖业经济的考察》一书，称得上是国壮多年努力钻研收获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在攻读博士学位时，他经过广泛阅读文献史料和相关研究论著，确定以“从自由市场到统制经济：近代四川沱江流域蔗糖经济研究”为题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随即进一步辗转各地搜集档案、报刊、方志及文史资料，比较幸运的是，不久又经努力争取到了前往日本关西大学进修学习一年的机会，不仅提高了日语水平，更重要的是扩大了学术视野，并搜集到了许多与博士论文选题相关的日文资料和论著，从而为写好论文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史料基础。

正因为如此，国壮没有延长攻读博士学位的时间，在三年内选修了全部学位课程，并完成博士论文的撰写而顺利毕业。由于博士论文写得十分扎实，论述比较深入，在此基础上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也顺利通过。随后，进一步补充相关史料，扩充研究内容，最终完成了这部学术专著。该书除绪论和余论之外共计五大章，每章的内容都比较丰富，第一章从生产区域、制糖技术、生产组织、外糖输入等方面，论述了抗日战争前中国糖业发展及统制实践；第二章探讨了政府对市场酒精糖料供应的统制，尝试从新的视角分析抗日战争时经济统制、液体燃料政策的得失；第三章考察政府对蔗、糖价格的干预及调控，透过一系列蔗糖纠纷案具体分析了“蔗糖评价制度”的

实施、效果及影响；第四章主要论述了抗日战争时食糖专卖政策，阐明政府如何以此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掌控，对糖业发展产生的各方面影响，以及官商之间的冲突；第五章从手工制糖技术革新、机器制糖业发展、政府的金融扶植等方面，论述了抗日战争时糖业统制对大后方蔗糖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多重影响。全书主线明确，条理清晰，并运用区域经济史理论、经济成长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对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证，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可以说，该书对于深化抗日战争时期的统制经济、四川经济史乃至抗日战争史研究，均不乏积极作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对每一位博士生而言，博士论文的撰写都是一个痛苦和艰辛的历程，其间充满了酸甜苦辣，五味杂陈，难以言表。我虽遗憾地未曾攻读博士学位，但自从1995年担任博士生导师以来，与所带众多博士生一起也感同身受，不无体验。另外，博士论文的撰写也是各位年轻学子经受严格学术训练而步入治学门径的良好一途，如能选取一个具有较大学术价值和较好发展空间的论文选题乃至研究领域，再经过不断的发奋努力，不仅能够写出一篇优秀的学位论文，甚至还会影响到其一生的治学成就。

可以预见，国壮正是沿着这样一条学术之路不断向前发展的。现今奉献给史学界的这部著作尚属于其学术处女作，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还会看到他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曾说过：“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所有“章门弟子”都应永远铭记这句话，不停地思考，不断地探索，为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朱 英

2015年春节写于桂子山

目 录

序	
绪论	1
第一章 抗日战争前中国糖业发展及统制实践	30
第一节 抗日战争前中国糖业的发展状况	31
第二节 抗日战争前中国糖业统制的实践	43
第二章 保证供需: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酒精糖料统制	57
第一节 酒精糖料问题	59
第二节 “平价”、“统购”——以国营酒精厂方的努力为主	67
第三节 “评价”、“配购”——以川康区食糖专卖局的努力为主	83
小结	100
第三章 调控价格: “蔗糖评价制度”的实施	104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蔗糖纠纷”的产生	104
第二节 蔗糖评价制度的实施	110
第三节 蔗糖纠纷调处中的“官民互动” ——以1945年、1946年内江蔗糖评价纠纷及调处为例	120
第四节 价格调控对蔗糖业发展的影响	129
小结	132
第四章 “全面干预”: “川康区食糖专卖政策”的推行	134
第一节 专卖机构的设立及专卖政策的内容	134
第二节 对糖品市场的干预	140

第三节 食糖专卖所产生的影响	148
小结	161
第五章 经济统制与行业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蔗糖经济发展	164
第一节 手工制糖技术的革新	164
第二节 机器制糖业的发展	177
第三节 政府对业糖者的金融扶植	185
小结	202
余论：“悖论型增长”——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糖业的发展及困境	206
参考文献	213
附录 抗日战争时期食糖专卖暂行条例	224
后记	229

表 目 录

表 1-1	1899—1908 年 10 年间镇江港输入外糖数量	37
表 3-1	每万公斤甘蔗制成糖清成本	105
表 3-2	最近 12 年内江糖类市价	105
表 3-3	1945 年每万公斤甘蔗生产成本调查	115
表 4-1	川康区食糖专卖局各分支机关辖区一览表	135
表 5-1	旧法土辊与小型榨机的比较	171
表 5-2	优良蔗种在各年的推广成果	173
表 5-3	1942 年内江县各乡镇优良蔗种植面积	174
表 5-4	华农糖厂主要机器设备	178
表 5-5	华农糖厂的制造设备	178
表 5-6	制糖厂调查表	180
表 5-7	内江县糖类运销加工厂家调查表 (1946—1949)	181
表 5-8	资中球溪镇 1937 年预糖情形	187
表 5-9	四川省甘蔗试验场对资中、内江两地部分地区 1937 年负债 农户调查	190
表 5-10	内江银钱业一览表	195

一、研究旨趣及问题意识

历史是什么？历史的价值在哪里？这些问题萦绕在每一位史学工作者的脑海中，让每一个踏入历史研究殿堂的人都必须设法去面对它们，以便求得心灵的平静。过往的圣贤，时下的史学名角、花旦，皆对其有颇多论述，故不一一赘述，只是强调一下历史研究在过去、现在及未来中的沟通作用。正如莱布尼茨常说的：后退才能跳得高。赫拉克利特为物理世界写下的格言：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历史就是力图把所有这些凌乱的东西、把过去的杂乱无章的细枝末节熔在一起，综合起来浇铸成新的样态。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曾把历史学家称为回顾的预言家。“除了对过去的一种预言以外，也是对过去的隐蔽的生活的揭示。历史学家不可能预告未来的事件，他只能解释过去。但是人类生活乃是一个有机体，在它们之中所有的成分都是相互包含、相互解释的。因此对过去的新的理解，同时也就给予我们对未来的新的展望，而这种展望反过来成了推动理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动力。”^①

糖品是人们生活中的日常消费品，糖业在手工行业、国民经济、饮食革命、中外交流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近代四川沱江流域蔗糖经济繁荣的局面虽已逝去，但人们依旧陶醉于其昔日的繁荣景象中，“甜城”两个字是内江人民心头永远抹不去的追忆。从萌芽到极度繁荣再到销声匿迹，四川沱江流域蔗糖经济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一道优美的弧线，也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历史智慧和经验启示。沱江流域蔗糖经济悖论型增长模式，因时而成，凸显了近代社会转型中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困境。弄清楚沱江流域蔗糖经济发展的内涵、制约其发展的深层次矛盾等问题，对时下区域优势经济体

^① [德] 恩斯特·卡西尔，甘阳译：《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45—246页。

的打造不无借鉴意义。

清代四川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使一些地区出现了棉、桑、蔗、烟、茶、果等专业种植区，逐步形成了初级的区域间生产分工。在这个过程中，沱江流域以其在蔗糖经济方面的特色成为川省著名的蔗糖经济区。该地区的植蔗面积达到全省的76%，“(四川)产糖区域分布，最主要者，均在交通运输便利沿江沿河各地，其中以沱江流域为主。本省蔗糖事业，集中于此，其种植面积占全省76%，其制糖方面，如工具及技术分工之精细，皆为他区所不及。在此区域中，内江及资中，富顺，简阳一部产白糖，资阳、金堂及简阳一部产红糖，前者可称之为白糖区，后者可称为红糖区”^①。在沱江流域，农家保有较高的植蔗率，根据四川省甘蔗实验调查，沱江流域户均植蔗面积达到47.87%，其中简阳、内江更是分别高达60.20%、57.50%。^②在蔗糖产量方面，全川主要产糖县份有46个，而“沱江流域之内江、资中、简阳、金堂以及富顺一带，产量约为全川产量之70%，乃四川糖业中心”^③。在糖品贸易方面，沱江流域由于川南地区密集的河流分布而构成了水路运输交通网，从而推动沱江流域糖品贸易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糖品销售的区域内市场。

另外，沱江流域的内江县，是该地区的糖品集散中心、糖业金融中心、川康食糖专卖行政中心（食糖专卖局专属设在内江）、糖业技术中心（四川省甘蔗试验场设在内江西圣水寺内）。相对于长江上游地区这个巨区来说，沱江流域是一个相对较小的中区，其在植蔗习惯、手工制糖技术、糖品贸易等方面的特色，使其成为透视川糖经济乃至近世中国糖业经济的独特视角。

综上所述，本书的问题意识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在手工行业史研究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事业的全面繁荣，近代农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逐步受到学界的重视，关注的问题及研究的取向都有较大变化，即由分析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资本主义萌芽等宏观问题而发展到分区域、分行业的具体研究，由对资本主义压榨、摧残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政治取向一面，转而表现出强烈的学术关怀和现实关怀，新领域不断拓展，新观点也不断涌现，标志着这一研究领域的进一步

① 杨寿标、朱寿仁调查，钟崇敏撰述：《四川蔗糖产销调查》，重庆：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所，1940年，序言，第21—22页。

② 四川省甘蔗试验场：《沱江流域蔗糖业调查报告》，第四章，1938年，第1—2页。

③ 内江地区档案馆：《民国时期内江蔗糖档案资料选编》上，1984年，第2页。

细化和深化。^①

近代以来，手工制糖技术有了一定的发展，制糖业成为重要的手工行业之一。但近代以来制糖业的行业整体发展状况、手工制糖技术水平等方面的研究，则相对滞后于其他手工行业史的研究。就目前的手工业史研究状况而言，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等行业多有大量研究专著、宏文问世，而手工制糖业则未受到较多关注，不能不为之遗憾。

同时，学界在认识传统手工业与近代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时，存有较大分歧，有发展、不发展、中间经济等观点。^②实际上，发展与不发展是可以共存的，是一个悖论，近代手工制糖业的发展状况很好地凸显了这一悖论。我们应将区域研究同行业研究结合起来，对近代四川沱江流域蔗糖经济进行分析，弄清其独特的行业特点及地域差异，从而丰富手工业行业史的研究。

(2) 在区域社会史研究方面。所谓整体研究，是指站在宏观的角度，对某个问题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整合，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探讨它的长期存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其地位，全面评价其作用，等等。所谓区域研究，是指站在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小到一村一县的研究或更大的区域如一省一流域的研究。

施坚雅认为近代中国大概可以分为 9 个主要的、人口密度较大的区域，其中每个区域四周都有一圈圈的同心圆周，人口密度随距离而递减。每个人口密度的“核心”均被九大自然地理区中的一个团体围住，而构成地区界限的分界线一般都穿过人口较稀疏的区域。19 世纪末已形成了若干以一个大都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华北为北京、西北为西安、长江上游为重庆、长江中游为武汉、长江下游为上海、东南沿海为福州、岭南为广州等。^③

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段本洛、张圻福：《苏州工业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2年；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彭南生：《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彭南生：《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赵冈、陈钟毅：《中国棉业史》，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美〕李明珠著，徐秀丽译：《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

②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汪敬虞：《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88—101页；彭南生：《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③ G. W.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282-283; 〔美〕施坚雅著，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

王笛根据施坚雅的区域地理系统论，把长江上游地区进一步细化。长江上游地区的自然地理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以长江为主干，各支流自北而南注入，形成了一个以航运为中心的交通联系网络，这些江河往往成为大多数经济区的自然界限。所以，长江上游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巨区，又可分为若干较小的、有若干层次的经济区。在清代长江上游，存在着围绕8个城市运转的经济和商业贸易区域，即以重庆为中心的上川东区，以顺庆府城（南充）为中心的川北区，以嘉定府城（乐山）为中心的上川南区，以叙州府城（宜宾）为中心的川南区，以泸州为中心的下川南区，以万县为中心的川东区，以广元为中心的川西北区。上游中小城镇稠密，主要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各地市场相联系的大宗商品就有一定的地域性，出现了一批以商业贸易为中心的城市和口岸，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显露了地域的区别，从而形成了经济区。这种区域经济的划分往往以地域的自然界限为基础，以大宗商品作物和工商经济的分布为依据。^①

沱江流域包括7个县，分别是上河地区的金堂、简阳、资阳，下河地区的资中、内江、富顺、泸县。沱江河及成渝公路是其交通大动脉，蔗糖经济的形成及发展使其成为近代四川著名的蔗糖经济区。把行业研究与区域研究结合起来，有助于区域经济研究的细化和深化。

(3) 在社会群体研究方面。从中国步入近代开始，其就经历着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而且到目前为止，这一过程仍在继续。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社会群体不断地发生裂变，旧的社会群体淡出历史舞台，新的社会群体崭露头角。新群体的产生，尤其是工商业者群体的产生，不仅反映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变动，也体现了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蜕变。

最早关注中国近代社会群体及其关系并对此进行初步研究的学者，大都是国外学者，如20世纪50年代初，何炳棣、张仲礼对绅士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小島淑男、白吉尔、费正清、芮玛丽等对商绅阶层的考察。^② 他们的研究还不足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群体的特征及其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相形之下，国内学者对社会群体及其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以社会群体为主题的研究，其兴起具有深远的学术背

^①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11—212页。

^②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关于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小島淑男：《辛亥革命時期の士紳：商人階級と上海獨立運動》（辛亥革命时期的士绅：商人阶级与上海独立运动），《東洋史編》1960年第6期；〔法〕白吉尔著，张富强等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景。可以说，社会群体的研究是对原有单一‘阶级研究’的突破。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资产阶级研究之中，章开沅等学者率先提出以‘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社会团体’的视角来代替单纯的阶级研究，可以避免将历史研究程式化和简单化，更易于发现历史的丰富内涵。章开沅等学者还大力提倡加强对近代官、绅、商、学等各式社会群体的研究，并有《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这样的力作问世，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① 起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层社会群体方面，如徐鼎新、马敏、虞和平、李达嘉、冯筱才等学者对商人群体的研究，李喜所、王奇生等对留学生群体、县长群体的研究。^② 此后，随着“眼光下移”的研究趋向，使社会群体的研究更趋于扩散，下层社会群体的研究被纳入到研究者的视野。^③ 近几年，处于中间阶层的自由职业群体逐渐被纳入到学者的研究视野，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④ “通过对各个社会群体的研究，近代中国的社会全貌、近代中国各个阶层民众的生活实况得以重新构建，也充分体现了社会群体研究在整个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位置和作用。”^⑤

如上所述，上中下各个有一定特征的社会群体皆被纳入到学者的视野

① 朱英：《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研究的几个问题——侧重于律师、医师、会计师的论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65—74页；章开沅、马敏、朱英：《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②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李达嘉：《上海商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1905—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湾）第22期上册，1993年6月；《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湾）第23期上册，1994年6月；冯筱才：《江浙商人与1924年的“齐卢之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湾）第33期，2000年6月；王奇生：《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人事嬗递——以1927年至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为中心》，《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97—116页。

③ 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严昌洪：《近代人力车夫群体意识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63—72页；黎霞：《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工人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④ 张丽艳：《通向职业化之路：民国时期上海律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孙惠敏：《中国律师制度的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1911—1912）》，台湾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魏文享：《近代职业会计师之诚信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111—118页；魏文享：《近代上海职业会计师群体的兴起——以上海会计师公会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198—206页；尹倩：《民国时期的医师群体研究（1912—1937——以上海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⑤ 朱英：《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研究的几个问题——侧重于律师、医师、会计师的论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65—74页。

当中，但对行业中出现的新经济群体的研究还不是太充足。例如，蔗糖经济中的蔗农群体、制糖者群体、糖商群体、经纪人群体，他们既是沱江流域糖业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体现。通过对这些新经济群体的分析、诠释，不仅可以借此观察沱江流域蔗糖经济发展对区域社会的影响，而且也可以丰富社会群体研究。例如，糖商群体来自不同的地方，为了分享糖类产品的销售利润，他们积极地参与糖品的运销活动。他们不仅仅是单纯的参与者，而且也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帮派，组织自己的同业公会，并推动城市的发展及地方金融市场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合作和抗争，但他们是如何合作的？如何抗争的？尤其是在蔗糖产销政策由预卖预买到甘蔗评价，由自由买卖到食糖专卖的转变过程中，他们有何作为？同时，这一行业社会群体与职业社会群体有什么相似和相异之处？这些都有待于细细地推敲。四川省是一个炮哥文化盛行、江湖习气浓重且较为封闭的内陆地区，对这一群体的分析，可以从区域行业史的角度丰富社会群体研究。

(4) 在农村经济史研究方面。就目前的学术成果来看，华北、华南两地是近代乡村问题研究较为成熟的区域。^① 这两个地区的研究成果多以棉农、茶农、蚕农为中心展开讨论，它们为我们透视其他地区或其他新型小农，如烟农、蔗农提供了经典的分析模式。

比如，对农家经营模式的探讨。近代中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自然经济开始逐步解体，农户家庭中的“耕”与“织”两部分发生了分化和组合。^② 近年来，学界对农家经营模式的认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传统观点认为，近代以来，随着资本列强的入侵，农村自然经济和城乡手工业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造成了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从而为

^① 罗仑、景甦：《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社会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苑书义、董丛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美〕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著，陶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美〕白凯著，林枫译：《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年》，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美〕李怀印著，岁有生、王士皓译：《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和农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② 彭南生：《论近代中国农家经营模式的变动》，《学术月刊》2005年第11期，第82—92页。

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①，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农家经营模式中的“耕”与“织”的分离。随后这一观点备受质疑，这些质疑不仅包括对单线历史观的评判，也包括对“耕织结合”多元分解过程的重新界定，强调分化组合的多元性、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及时间上的不均衡性。^②

与同时代其他区域的农民植蔗相比，沱江流域的蔗农家庭经营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已有研究成果对其有一定的关注，如对下河地区蔗农（植蔗）—糖房（榨蔗成糖清或制成红糖）—漏棚（漏制白糖）这一生产流程的肯定。^③植蔗与制糖的分离是该行业“耕织结合”（农工结合）家庭经营模式变动的体现，但它并不是该地区“耕织结合”家庭经营模式变动的全部，还存在着另外两种农家经营模式——自种自榨自经营和合作社经营，同时这两种“农工结合”经营模式也并非传统意义上“耕织结合”模式的翻版。另外，具有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性质的糖房、漏棚为何没有突破传统生产工艺的限制，促进生产力发生质的突破，而反倒成为下河地区蔗糖纠纷的策源地？因此，弄清不同的生产形态，既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透视新经济群体——蔗农的生存状况，也对近代乡村经济研究的进一步细化大有裨益。

二、学术史回顾及思考

沱江流域位于四川省中部，年平均气温约为 18 摄氏度，年降水量约为 1000 毫米，较适宜种植甘蔗。近代以来，沱江流域以其在糖品产量、制糖技术、市场结构等方面的优势，成为四川地区著名的蔗糖经济区，蔗糖经济的形成及发展也推动了区域社会经济的近代变迁，这些特点及影响使其成为学者们关注

①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

② 徐新吾：《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 年第 1 期，第 101—110 页；陈惠雄：《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历史研究》1990 年第 2 期，第 116—130 页；谢放：《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1 期，第 98—109 页；彭南生：《论近代中国农家经营模式的变动》，《学术月刊》2005 年第 11 期，第 82—93 页。

③ “这一时期，制糖手工工场的规模和生产技术都较前有了大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从蔗农（原料）—糖房（半成品）—漏棚（成品）的一整套手工业生产流程……（搭搞，即自种自榨自经营）毕竟属少数。”刘志英：《论近代沱江流域的制糖工业》，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2 年，第 13—14 页。“当时内江的蔗糖业在原料供应、制作过程、销售业务、金融流通等方面已经形成了‘蔗农+糖房+漏棚’一条龙的纵向协作的经营模式。一般来说，这种经营模式既利于蔗农解决缺钱、缺技术、缺设备的问题，又利于糖房解决缺原料、缺劳动力的问题。”胡丽美：《抗战以来四川内江的蔗糖纠纷》，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第 5、8—9 页。

的重点对象之一。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两本专著^①，3篇硕士论文^②，1篇博士学位论文^③，20多篇学术论文。^④其所探讨的问题涉及手工制糖技术改良、机器制糖工业的发展、糖业经济的形成及发展、糖业与区域社会关系、糖业事件等多个研究领域。而从国内区域糖业史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关该区域的成果最多，也最为成熟，沱江流域的糖业也就成为一个研究内陆糖业史及手工行业经济史的典型范例。因此，对其进行回顾及思考，既可以避免低层次重复而枉费宝贵的资源，也可以明确糖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推动糖业史及手工行业经济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一）有关四川沱江流域糖业史研究成果的分析

根据已有研究所探讨的问题，我们从土法制糖技术、蔗糖经济的形成及发展、糖业融资、糖帮及糖业群体组织化、川康区食糖专卖、蔗糖纠纷等几

① 参见陈初尧、袁幼菊：《四川土法制糖工艺》，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58年；陈栋梁、李明生：《内江糖业史》，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90年。

② 刘志英：《论近代沱江流域的制糖工业》，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2年；胡丽美：《抗战以来四川内江的蔗糖纠纷》，四川师范大学未刊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邱晓磊：《抗战时期川康区食糖专卖局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③ 赵国壮：《从“自由市场”到“统制市场”：近代四川沱江流域糖业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④ 主要学术论文有：陈祥云：《近代四川商品农业的经营：以甘蔗市场为例》，《辅仁历史学报》（台湾）1998年第9期，第137—164页；陈祥云：《蔗糖经济与城市发展：以四川内江为中心的研究（1860—1949）》，《国史馆学术集刊》（台湾）2002年第2期，第83—122页；陈祥云：《蔗糖经济与地域社会：四川糖帮的研究1929—1949》，《辅仁历史学报》（台湾）2008年第21期，第83—122页；张朝晖：《论抗战时期川康区食糖专卖》，《档案史料与研究》1999年第3期，第63—68页；张朝晖：《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川康区食糖专卖政策》，《文史杂志》2000年第4期，第26—29页；覃玉荣等：《抗战时期川康区食糖专卖政策对内江糖业的影响》，《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3期，第128—131页；刘志英：《论近代沱江流域制糖工业的兴衰》，《内江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第81—86页；刘志英：《论抗战时期四川沱江流域的制糖工业》，《内江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第51—56页；刘志英、张朝晖：《抗战时期沱江流域制糖业的近代化》，《文史杂志》1998年第6期，第62—63页；胡丽美：《浅析1946年内江蔗农的请愿活动》，《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第154—157页；胡丽美：《抗战时期四川内江蔗糖业的长项债务纠纷》，《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1期，第51—55页；朱英、赵国壮：《试论四川沱江流域的精品流动（1900—1949）》，《安徽史学》2011年第2期，第70—77页；赵国壮：《“经济惯性”与“政策承续”：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糖业极度繁荣的原因新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24—31页；赵国壮：《论清末民初手工制糖业的近代转型》，《求索》2011年第1期，第232—235页；赵国壮：《沱江流域与潮汕地区的糖业比较1858—1938》，《或问》第17号（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2009年12月出版，第113—134页；赵国壮：《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四川沱江流域蔗农农家经营模式研究》，《近代史学刊》2010年第七辑，第115—138页；赵国壮：《略论近代四川沱江流域糖业经营方式》，《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14—21页。